

Sinolinguistica

- Band 1 Kautz, Ulrich: Aktiv und Passiv im Deutschen und Chinesischen. 1991. XVI/200 Seiten, 8 graph. Darst. Broschiert. ISBN 3-87 276-645-7 DM 38.--
- Band 2 Wippermann, Dorothea: Liandongshi. Ca. 400 Seiten. in Vorbereitung
- Band 3 Kuhn, Barbara: Mnemotechnik und Schriftzeichenerwerb. in Vorbereitung

Sammlung Groos

- Band 32 Qian, Minru: Untersuchungen zur Negation in der deutschen Gegenwartssprache. 1987. X/366 Seiten. Broschiert. ISBN 3-87276-592-2 DM 66.--
- Band 28 Yuan, Jie: Funktionsverbgefüge im heutigen Deutsch. 1987. VI/349 Seiten. Broschiert. ISBN 3-87276-566-3 DM 59.--
- Band 42 Zhang, Dingxian: Komplexe lexikalische Einheiten in Fachsprachen. 1990. VIII/336 Seiten, 20 Abb., 22 Tab. Broschiert. ISBN 3-87276-643-0 DM 68.--
- Band 31 Zhu, Jianhua: Morphologie, Semantik und Funktion fachsprachlicher Komposita. 1987. VI/312 Seiten. Broschiert. ISBN 3-87276-589-2 DM 76.--

Beihefte zu TEXTconTEXT

- Band 4 Xue, Siliang: Möglichkeiten und Grenzen der Übersetzung klassischer chinesischer Lyrik in Deutsche. 1992. 596 Seiten. Broschiert. ISBN 3-87276-677-5 DM 88.--
- Wang, Yannong/Jiao, Pangyong (eds.), A Collocational Dictionary of Common Chinese Verbs (with English Explanations). 1985. XVIII/588 Seiten. Broschiert. ISBN 3-87276-547-7 DM 80.--



JULIUS GROOS VERLAG

Postfach 10 24 23 · 6900 Heidelberg 1

背离与弥合——汉语在大陆和港台的差异及其成因

彭兆荣

汉语是汉民族的共同语言，但目前大陆和港台汉语的差异是有目共睹的，这种背离现象本不足为怪。即便是大陆的汉民族在使用汉语时亦很不一致；而大陆港台之间存在着社会体制、人文地理、经济状况、文化模式等的巨大差异，因此，在对汉语的认识和应用上出现分离现象是正常的。

那么，大陆、港台之间的汉语差别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妨做一个情境试验。三个朋友准备外出，忽遇雨，看他们在同一情境中的语言反应：

北京人 香港人 台湾人

鬼天气， 哇，怎么下起雨了， 天气真够糟糕的，
这雨说下就下， 算啦， 算我们运气不佳，
得，呆会儿吧。 等等看啦。 等等看。

人们立刻就会发现三者口音上、书写上、用词上的明显差异，而且在语言表达时的声调、节奏上也有不同。更有意思的是，他们在对汉字的含义以及阐释上也有了分离。前些日子我遇到这样一件事：一位法国汉学家问我：“人情味该怎么界定？怎么翻译？”为了给他一个权威性的解释，我翻阅了《新华字典》、《辞海》，无奈没有“人情味”条。于是我查看了台湾的《国语辞典》，所幸有此条目，可看后，我自先糊涂了。其曰：“人情味是人和人之间温暖的情味”。我以为“人情味”本来比什么“温暖的情味”意义更明朗；何况“温暖情味”具有更多的文学诗歌中的意象性色彩，在美学上还颇有些“通感”的意味，比“人情味”愈发艰涩了。不得已，我去询问一位台湾辅仁大学中文教师，而他对此条目的解释并无非议。为指点迷津，他还为我举了一个例子，“比如我们看到法国人见到人很有礼貌，bonjour(你好)、merci(谢谢)常挂嘴边，这就是‘人和人之间充满温暖情味’”。这件事使我意识到，大陆台湾隔绝四十年，双方汉语分离已不仅仅体现在语言的外在表现形式上，而且也体现在对语言内在认识和理解上。这种背离迄今虽尚未达到双方在交流上发生困难，却足以使

双方感到别扭了。这种状况对于外国人学汉语则更不利。在法国，我也曾有过几位学汉语的学生，然他们对大陆、港台汉语背离现象总是抱怨不迭。有一位学过几年大陆教材，并在大陆留学过一年的社会学博士生，却时常为一两个简单的繁体字所难，以致于他最终叹息，学汉语等于是两门外语，“c'est beaucoup trop dur”（这实在太难了）。

造成这种背离现象的原因有些是显而易见的，有些则是潜在的。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作些肤浅探讨。管窥所及，祈请学者们批评。

(一)

普通话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按照袁家骅教授意见，现代方言分为七个区，即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和闽方言。（见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文字改革出版社）然一惯性观点认为现代汉语有八大方言，即在闽方言中分出闽北方言和闽南方言。在这八大方言中，北方方言的应用区域广，人口占汉族中的70%，且其内部的一致性极强；从哈尔滨到昆明，直线距离三千公里，两地人通话没有困难。而广东、福建两省却占了其中四种，粤方言、客家方言、闽北方言、闽南方言。福建更有“一山一语”之说，而且方言之间迥异。厦门人和福州人若操各自方言交流，是绝对的“对牛弹琴”闽方言对外地人来说，是百分之百的“外语”。

台湾与福建、香港与广东一水之隔，历史上双方关系过从甚密，香港的通行语是粤语。在台湾，闽南话是不言而喻的通行性语言。（台湾的人口主要由台湾本土人、1949年以前的闽南人和1949年从大陆各地到台湾三部分组成，前两部分主要操闽南话）这样的人文地理关系决定了港台汉语与大陆汉语巨大的分离性质。由于方言势力的影响，导致了香港地区的普通话带有强烈的粤语方言的音素，而台湾的普通话含有明显的闽南方言特点。比如，

大陆	台湾
我试试看，	我试看看，
你问问看，	你问看看，
我们等等看。	我们等看看。

台湾的这种表述就是典型闽南方言的翻板。另外，在粤语和闽南方言

中，“阿”、“仔”是常见的名词词头和词尾，故在港台汉语（包括口语和书面语）中大量出现这两个字，且意义极为广泛。以“仔”为例，它除了有汉语“儿子”的基本意思外，还有许许多多其他意义：兄弟仔（兄弟）、贼仔、（贼），加在人名后通常是昵称，加在职业后面是泛称或蔑称，如作田仔（农民）等等，这些都是闽南话、粤语的直接套入。此外，粤语方言和闽方言中有些音素没有，因此在讲普通话时常发生混乱，比如广州话声母N和L经常混；福州话中的h、f经常混，“吃饭”说成“chi han”，“大方”说成“da hang”等等。

“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见Edward Sapir, Language, 中译本，129页）。汉文化是一个总体或总称。就中华民族的历史而言，其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尤其是大陆、台湾、香港，表现尤为突出。大陆自一九四九年以后，其文化进入一个近乎封闭的自行发展轨迹。从其脉络来看，它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批判精神和狂热进取的态度。在汉语改革上，亦复如此。国家强化推行一系列语言政策。例如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关于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和汉语规范化三大任务。这些问题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抓。周恩来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政协全国委员会上作了题为《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说：“在我国汉族人民中努力推广以北京语言为标准的普通话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见《语文现代化》1980，第1期）这种一国总理亲自抓语言改革在中外语言历史上均属罕见。对那些“方言重灾区”，国家更是花大力以图引导。八十年代初期，我去广东、深圳，在公共场所到处可见“请讲普通话”的标语，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更是不遗余力。这种由政府自上而下地推行语言政策，使大陆的汉语达到了一个相当高水准的统一。

台湾的情形绝然不同，甚至与大陆有背道而驰的倾向。其汉语通行的原则是“复古”。虽然台湾在语言上并未开展什么“运动”，也未颁布什么大的政策法令，但台湾通用的汉字是百分之百的繁体字，口号大都搬用古语，语义大都沿袭古义。比如“爱人”，旧指情人，台湾沿用旧义。大陆指丈夫或妻子。“书记”旧指文书，台湾沿用旧义；大陆则指党团主要负责人。再如“搞”字，旧义多指做不好的勾当时用搞，如“搞什么鬼”、“搞什么名堂”、“搞女人”等，台湾

仍袭此义，将其划入贬义词范畴。大陆则增了不少新义：“他搞来几张票”（得到）、“他是搞数学的，我是搞语言的”（研究）等。这些看上去仅仅是只言片语上的差异，实际上是文化继承上的差异。

香港的情形又不同。众所周知，在香港的通用社交工具是粤语。五十年代以前，普通话被说成“外江语”——即外江佬说的话。香港是个殖民地，它的官方语言则是英语。因此，近一百五十年来，香港在语言和文化上具有一种自我发展的机制。而粤语文化、西方文化和大陆文化都不是可以轻易取代的。作为中国人，他们对普通话有一种忠诚；作为省港人，粤语是乡音；作为殖民地的香港人，他们知道官方语言——英语对于自身利益的重要性，何况它是世界第一语言。这种文化上的冲突与消融决定了语言上的特殊状态。这也是为什么在香港地区盛行“洋泾滨”语言(Pidgins)。中国语法的英语不少，如“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见）是“I have not seen you for a long time”的中式变体。在普通话中夹着半生不熟的英语单词更是随处可见，先生叫“阿蛇”（sir），出租车叫“的士”（Taxi），胶卷叫“菲林”（film）等等。近年来，大陆香港的各种接触日益增多，香港在经济上的“内驱力”使得港语演化出一种所谓“开发语”——即“以广东腔的普通话为基调，中间夹着一些英语单词的语言”这种语言在小青年中（包括香港和大陆）成了一种时髦。显而易见，这种开发语（三语共存）现象是一个历史文化的映照，它还将持续存在一个历史时期。同时，它亦是一九九七年的先兆性文化产物。

语言的交往也是具有文化背景的。香港、广州、厦门、台湾历史上都是重要的开放埠；近代的外来文化不少是从这些口岸“浸”进来的，中国文化也很多是从那些地方“输”出去的。而这种文化交流的语言使命则经常由地方性语言来完成。法国尼斯大学与中国的厦门大学系姐妹学校。一次一位尼斯大学的教授问我为什么好端端的Amoy要改成Xiamen。是的，西方人最早接受厦门是从闽南语的Amoy来的。就象为什么茶在英语中叫tea，法语中叫thé，德语中tee，它们都源于闽南方言（te）。这说明中国的茶叶是从福建由海路输出的。同样西方的语言文化从这些地方“输入”的也不少。鸦片战争把中国人民推向苦难的深渊；而“鸦片”（Opium）就是用广州话来定型的，此外还有三明治（Sandwich）。“的确凉”（Decron）最早在广东人口里是“的

的确凉”，“靛”是典型的广东语言，意为漂亮。再如“唛”的广州音为[mak]，是英语[mark]的译音；在现行的《新华字典》中“唛”就是指“进口货物的标签”。这些例子均说明，港台汉语都是受到粤方言，闽方言影响的语言，这些语言在历史上起过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这种特殊语言现象在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普通话的历史文化中并不多见。而这正是大陆汉语和港台汉语差别的成因之一。

（二）

汉语在大陆和港台表现上差异的另一个原因是政治因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讲政治统帅的历史，几十年的政治运动在汉语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因此，在大陆汉语的语汇库里有一大批唯大陆人能够理解和应用的词汇，诸如，大跃进、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反动性、优越性、忆苦思甜、牛鬼蛇神、黑五类、可教子女等等、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发展到极端无疑是文化大革命，极端的革命造就了极端的语言——“文革语体”。所谓“文革语体”实际上是一种语言变体，是语言在非常时期的非时期的非常用法。总体上说，是非经验、非理性、非逻辑词语大荟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内容上，以“斗争”为总则；如斗、批、改，稳、准、狠，大革命、大批判、大斗争，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等等。（2）措辞上，惯用绝对、非理性甚至于近乎宗教式语言。在“文革语体”中“最”是最常用的词汇，有最伟大的领袖、最伟大的统帅、最伟大的导师、最伟大的舵手；最高指示等等。许多都是个人崇拜的产物，什么“无限”；、“无比”、“彻底”、“极”等等常见诸于报端。（3）句法上，常用祈使句，排比句，感叹句。比如：“同志，该是清醒的时候了！”“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之类。

“文革语体”虽然是一个短暂历史时期的语言现象，可其影响并不小，甚至波及海外。在法国的时候，有一位正在自学中文的大学生得知我是大学中文系教师，便来拜访我。我欲了解其汉语水平，让他说一两个中文句子。不料他开头一句便是“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这令我吃惊不小。经了解他初学中文时的教材是文革期间由北外编的。他告诉我他还能背不少文革语句。有些词本身按说并不是

典型的文革词汇，却是通过那个时代的政治传播方式播散的。记得有一次到阿拉伯市场去购物，卖主一眼看出我是大陆来的，便称呼我叫camarade(同志)，并说：“你们中国不称monsieur(先生)而称革命同志”。我猜想，类似语言大约是当时搞“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传播出去的。

港台汉语完全是循着他们自己的道路发展的，尤其是台湾。如果我们用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来说明大陆和台湾的汉语是可以的，但却很不够。因为这不仅仅是语音(pronunciation)、语调(accent)的不同，其中还有许多别的因素。因素比如台湾的语文完全是在继承“国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无论在口语或书面语中，台湾的古字、古语的应用比大陆多得多。不少还在停留在“文言”状态。比如在政治性口号上，台湾也多用古语。五十年代台湾说说“枕戈待旦”，六十年代说“壮敏自强、处变不惊、慎谋能断”，七十年代有“自强不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等。另一类口号，是用遗嘱上的语言(孙中山遗嘱)(蒋介石遗嘱)也都是清一色仿古书用语的句子。

这种语言分离现象最终演变成一种语言规律，台湾是仿古的、复古的；大陆是现代的、俚俗的。什么“猛干、狠干加巧干”；“你追我赶争上游，我追你赶增高产”之类，白而易懂，具有鼓动性。最有意思是五六十年代大陆台湾各喊一句口号，“解放台湾”、“光复大陆”、意义可谓无异，口气可谓无差，措辞则一今一古，很是别致。

政治性因素在语言的使用上还表现出一种语势差异。经历过长期政治运动的大陆人语态(包括遣词、声调、音量、语势等)比较犀利、尖锐，语言很露机锋。这是政治斗争，尤其是“文革”留下来的语言惯性。台湾人的语态就相对温和、儒雅，这是传统的儒家文化熏陶的结果。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一九八七年在新加坡举行的“亚州大专辩论会”，其最后决赛是在大陆的复旦大学和台湾的台大之间进行。决赛议题为“儒家思想能否整治西方歪风”。台大为正方，复旦为反方，双方你来我往，十分精采。最为吸引人的还是两校弟子在语态、语言风格上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差别。台大弟子对“四书五经”很熟悉，引经据典，侃侃而谈，温文尔雅，儒风十足。复旦弟子的语辩能力极强，反应快，幽默反讽、妙语连珠，机锋毕露。这种差异，若排除政治因素是不能求得完满解释的。

语言上的政治影响还表现在对领袖伟人语言的应用上。在大陆，毛泽东的话是最高指示，被奉为圭臬。大陆青年，(除了上了大学中文系的)对中国古代诗文所知甚少，即便知道一些，也主要局限在毛泽东诗文中用过的典故，比如愚公移山、嫦娥奔月之类。古代文化被当作“封、资、修”的东西。在伟人中，除了毛泽东，对现代语言文学影响最大的当数鲁迅。鲁迅语言的那种战斗性、犀利性、刻薄性、一针见血性都达到了空前。而这种语言恰好又与政治性的战斗语体十分吻合；因此，鲁迅的语言实际上成了一种典范。他给现代汉语留下的功绩是巨大的。现代语言中许多战斗性、形象性极强，哲理性、幽默感极具的语言都是直接从鲁迅的诗文中来的。比如，“阿Q”、“精神胜利法”、“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等。鲁迅行文生动活泼，但他有一嗜好，即爱翻造字。比如：“老头子”翻造成“小头子”；纠正一纠歪，阔人一窄人，百忙一忙碌，古典一今典，古董一新董，先烈一后烈，人格一鬼格，高尔基一尔础高等等。据统计，凡此种种，共一百余条。(参见《中国语文》1981年第1期)然由于鲁迅的不可批评性，决定他的语言的典范性。而这种伟人语言的绝对典范性，又构成了大陆汉语和港台汉语的差异之一。这一切又都是政治因素所决定的。

(三)

“任何一种语言都不象我们描写的语法(即描写语言学中语法)有时规定的那么一成不变。如果有足够的资料，我们总可以找到语言在各个方面的差异，例如语音的，语法的，词汇方面的差异。这样的一些差异，可以循着共时的(Synchronic)三维——地理的、社会的、文体的——加以研究”。(见W. Bright and A. K. Ramaunjan “Sociolinguistic Variation and Linguistic Change” 1964)语音、语法、词汇属于语言的内部结构范畴，地理、社会、文体属于社会语境范畴，后者对前者施以极大影响。当今对普通话影响最大的大约有三个方面：一是北京方言土语，二是港台汉语，三是外来语。

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重要性时常要通过语言渠道表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在普通话中有那么多京味浓烈的东西。比如在二三十年前的帅、棒、压根儿、奔头、纳闷儿、没辙、节骨眼儿、颠儿等北京土语今天已经进入《新华字典》。

而当今的“盖”、“盖了帽了”、“侃(砍)”、“砍大山”、“特溜”“整个一(傻帽)”等又在全国风行。最引人入胜者无疑是“倒,倒爷”。“倒爷”没有定义,也不要定义,谁都知道、谁都讨厌,却谁都不得不承认这个词的生动性。一位台湾学者在了解其内涵以后,伸出拇指说“生动”。一个“倒”字,涵盖面极宽,它几乎是万能词,倒肉、倒鱼、倒烟、倒酒、倒化肥、倒钢材……。一次我与一位台湾朋友聊天,我告诉他现在大陆有人“倒车”,他听罢,把双眉一挑:“好好的车,把它推倒干嘛?”待我说明,他才说:“原来倒车就是我们台湾‘二手车贩’”。毫无疑问,“倒(爷)”也是北京土语演变出来的,它在瞬息之间生了大陆通用性语言;一则是由于北京方言,二则由于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至于“儿化”,更是成为“普通话的漂亮”的标准。这说明北京话作为一种方言还在有力地制约着已经不是方言的普通话。

港台语言其所以成为一种时髦,除了政治性原因(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台湾和平统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港台经济发展迅速。于是大陆普通话不得不对原来听起来极不顺耳的“哇、啦、阿、仔”的粤语腔调持宽容态度。大陆一些小青年更以此为时髦,以示“有钱”。加之近些年来粤语片,粤语歌曲,香港武侠小说充斥市场,人们渐渐地开始习惯了。甚至不少人花钱去学粤语。这成了人们去广州、深圳、香港的必修课。至于那些诸如,嗱、乜、男嫲、叫囡等怪腔怪字更是多了起来。

与此同时,大陆人也开始学会辨析“在水伊方”的台湾汉语了;然而,人们毕竟吃惊地发现,大陆汉语和台湾汉语的差别大得超出人们的想象,

大陆	台湾	大陆	台湾
汉语	国语	宇航员	太空人
短语	片语	文工团	康乐队
水平	水准	安全岛	和平岛
行政	施政	旅游者	观光客
渠道	管道	教导处	训导处
认可	认同	实权人物	实力人物
客人	人客	一所学校	一间学校

有时同一字词意义完全不同,台湾人说“盖”意思是“吹牛”、“胡扯”,大陆则是“极好”;台湾人说“检讨”,是指讨论、商讨,大陆却指做错事之后的认错。有些词性在语法上大相径庭,如:

台湾: 我们清洁房间

大陆: 我们打扫房间 (或我们清理房间)

对我们来说,“清洁房间”是个病句。如果非要用“清洁”的话,至少要“使动”用法。当然,从语法角度说,形容词用入动词的例子很多,比如“纯洁语言”、“方便顾客”等等,但“清洁房间”在大陆汉语中绝对不符合习惯。很显然,我们现在遇到的并非纯语言法则的现象,准确地说,属于社会语言学现象,纯粹的语言法则时常爱莫能助。

语言是文化的载负者,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必然要反应在语言上,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各民族普遍存在一个外来语现象。汉语在接受外来语的总体情形与中国在世界上地位(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有关。“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大门被列强用大炮轰开,西方文化一并涌入。当时整个中华民族与其被迫接受外来语的情形是一致的。中国人一律把外来的人、事、物之前加上“洋”。洋人、洋枪、洋炮、洋车、洋火、洋灰、洋皂、洋帽等等。这种特有的语言表示包含着一种民族情绪,说明中华民族对那样的外来文化的抵触。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很快便把“洋”字给抛弃了。而许多外来词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为人们所接受,

坦克、扑克、酒吧、沙发、雷达、基因、凡士林、维他命、爱克斯光、爱兹病……

但是,由于香港是英国殖民地,大陆和台湾没有统一,大陆在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以后又很快地把大门给关了。所以,大陆、香港、台湾在接受外来语上很一致,以致成为他们在汉语分离上的一个重要部分。香港人是根据自己的文化去接受英语的影响,上面所说的“开发语”就是这种产物。台湾早先接受日本文化,后来又清一色地接受“美式”。因此,无论在外来词上,译名上都与大陆有很大差异。比如,information,大陆译为“信息”,台湾则是“资讯”;cartoon,大陆为“动画片”,港台为“卡通片”;Taxi大陆为“出租车”,台湾为“计程车”,香港是“的士”,“see doctor”港台译作“看

医生”，“make love”译为“造爱”，等等使大陆人感到迷茫，却又开始在不情愿中悄悄接受，因为港台在接受外来语方面“似乎”走在大陆的前面。

汉语，无论它是哪种形式，毕竟是汉语；所以，无论汉语在大陆和港台有什么差异，它毕竟是汉语。它并不妨碍交际，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弥合的。但汉语在大陆和港台的表現是存在差异的，很多方面差异还很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是背离的。弥合是相对的，背离是绝对的，二者对立而统一。历史发展、社会变革、文化差异决定语言变异是个常量。而一种语言内在的稳定机制又决定语言的弥合性。背离的过程决不会超过弥合的“度”，否则它就变异为另外一种语言了。任何一种发达的语言都具有这种语言内在的制约机制。对于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汉语来说，发生一些背离现象，不应该被视为不幸。而真正不幸者我以为是对这种背离现象缺乏一种良性选择。今天，我们有幸看到，随着大陆和港台的交流增多，汉文化的背离现象显然在缩小。一位台湾辅仁大学的中文教师告诉我，现在台湾的汉语已经出现了某种大陆化倾向。比如“一定”，原来在台湾的汉语用法它是一个纯然的意动词，与英语中的情态动词must相仿。而大陆则时常把“一定”当作形容词来用，什么“一定的水平”、“一定的效果”等，现在台湾也经常可以见到类似用法。同样，由于港台汉语的作用，大陆也出现了大量港台式的汉语用法。语言总在有意与无意之间贯彻着背离与弥合的原则。

汉语是一个奇迹。它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它历经千年而不断，这是举世无双的。它集哲学、绘画、艺术、创造于一体，是举世无双的。它的背离程度之大、弥合程度之高是举世无双的。安子介先生认为“汉语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是有根据的。英国科学家迈克·克鲁斯曾断言，人类总有一天都要学汉语（见《人民日报》海外版 1990年5月31日）不管人们怎么看待他的断言，是疯子的呓语抑或是天才的预言，汉语究竟是一个奇迹！

Divergenzen und Zusammenhang

- Unterschiede und die Entstehungsfaktoren des Hochchinesischen auf dem Festland, in Hongkong und in Taiwan

Zusammenfassung

Es ist eine Tatsache, daß sowohl hinsichtlich der Form als auch im Hinblick auf die Ausdrucksweise Unterschiede zwischen dem auf dem Festland, in Hongkong und in Taiwan gebräuchlichen Hochchinesisch bestehen. Dieses Referat, ausgehend von den folgenden drei Aspekten, beschäftigt sich mit den unterschiedlichen Entstehungsfaktoren.

1. Historischer Aspekt:
Ein wichtiger Punkt, der zu diesem Unterschied bezüglich des Hochchinesischen (putonghua) führt, ist der starke Einfluß der jeweils in Hongkong und in Taiwan gebräuchlichen Dialekte, deren Einfluß auf die Hochsprache wesentlich stärker bzw. mächtiger ist als es bei anderen Dialekten der Fall ist.
2. Politischer Aspekt:
Da die jeweiligen politischen Systeme auf dem Festland, in Hongkong und in Taiwan vollkommen unterschiedlich sind und seit über 40 Jahren keinerlei Kontakt zueinander haben, bestehen nicht nur im politischen Bereich Unterschiede, sondern auch im Sprachgebrauch. Ein Beispiel dafür ist der sogenannte "Sprachstil der Kulturrevolution", der sehr von der zeitbedingten politischen Kampagne geprägt ist.
3. Wirtschaftlicher Aspekt:
Heutzutage spielt die Wirtschaft eine entscheidende Rolle. Da die wirtschaftliche Situation in Hongkong und in Taiwan viel besser ist als auf dem Festland, werden die dortigen Sprachen nicht mehr als "Sprache auf einer winzigen Insel" betrachtet. Die immer mehr verwendeten Fremdwörter und neu geschaffenen Wörter in der Alltagssprache, vor allem in Technik und Wirtschaft, die meistens zuerst in Hongkong oder in Taiwan "erfunden" werden, werden Modewörter. Somit ist es auch verständlich, daß die ökonomische Lage eines Landes auch Einfluß auf Kultur und Sprache hat.